

“传达大声音”与“超越民族性”

——阿来的民族文学思想*

李国太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可以通过对地域文化和族群形象的呈现而实现，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功能不在于建构一个异域他者的形象，而应是通过超越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视域，展现地域、族群的真实面貌。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要具有民族性，还应该具备一切文学都具有的普遍性。本文论述了阿来的文学世界，它虽主要导源于对嘉绒这一藏边世界的书写，但其创作却试图实现人类性与民族性的融通；阿来以本民族的生活建构文学世界，又试图在文学世界中实现与历史和人类普遍命运的对话。

关键词：民族文学 文学表述 超民族性 人性深描

DOI:10.13760/b.cnki.csalt.2019.0014

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要具有民族性，也应该具有一切文学都具备的普遍性。如果仅仅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民族的书写而忽视了其普遍性意义，其价值便也大打折扣了。正如茅盾所言：“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①阿来自20世纪80年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伊始，便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所营造的文学世界虽然始终未离开“大地的阶梯”，但他总是力图通过对一时一地的书写寻求普遍意义。他的文学关怀早已超越了地域、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而直指人类的命运。但这并未消解阿来作品的民族性，他依然被视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濒危活态文献保护研究团队”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民国时期的‘边疆文学’表述研究”（项目编号：15XJC751001）阶段性成果。

①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576页。

其作品被广泛传播。本文试图从阿来对藏地的文学和文化表述,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对民族文学的自觉认知等角度,探究其民族文学思想。

一、从“形容词”到“名词”:藏地世界的文学表述

阿来的文学世界建构在对青藏高原东缘一个具体地域的书写上,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长期以来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识大多是标签式的,而这种不准确的描述往往成为外界对藏民族主要的认知。在许多人的观念中,青藏高原甚至成为乡野文化的代表,“变成了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阿来对这种简单化的倾向非常不满^①,作为藏族人,他对本民族的生活有切身的感知,因此他总能站在主位视角对外界虚构的“形容词”的西藏进行祛魅式表达。^②

在阿来看来,西藏也好,藏族也罢,都同样存在于现代化的世界中,因此变革对他们来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种将其视为社会进化阶梯上某一个阶段活化石的看法是片面和不准确的。正因如此,阿来关注藏族社会的变革。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塑造了麦其土司家的两位成员:叔叔和姐姐。叔叔在印度和英国经营着庞大的商业,而姐姐则早已在英国文化的熏陶中出落为一位英国式的夫人,如果我们将其与现在的麦其土司——“我”的父亲,未来的麦其土司——“我”的哥哥相比,便可以看到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上早已出现了个人选择的差异,这种差异基于对时事的认知,亦即对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在文中,叔叔和姐姐都回到了麦其土司的领地,这里是他们曾经的家園,但最终他们还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选择了离开:姐姐得到了金子后就说:“我想上路了,我想我该回去了。”“我该回去了”,是“我”姐姐在离开她曾经的家園时留下的话,对家里的亲人,她没有一丝眷恋。在她看来,离开藏地去往英国,象征着自己从野蛮之地到了文明之国。她骨子里

^① 他曾批评道:“乡野生活并不是香格里拉的天堂。青藏高原边缘这些步步升高的大地的阶梯上,也有很多的痛苦。只不过,蒙昧太久的人民尚未学会用自己的声音来进行表达!”阿来:《大地的阶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② 阿来不止一次表示:“有关藏族历史、文化与当下生活的书写,外部世界的期待大多数时候都基于一种想象。把西藏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师的国度,想象成传奇故事的摇篮,想象成我们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这个民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种种展示(包括书写)来满足这种想象,让人产生种种误读。把青藏高原上这个文明长时间停滞不前,大多数人陷于蒙昧的局面,描绘成集体沉迷于一种高妙精神生活的结果。……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去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去生活。”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黄河文学》,2009年第5期。

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英国的贵妇人了。而叔叔虽然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游历过的成功商人，却并未忘记自己是一个藏族人。当“我”问他“你也不回来了吗？”时，叔叔回答道：“我会变成一个英国人吗？我会变成一个印度人吗？不，我要回来，至少是死的时候，我想在这片天空下合上双眼。”于是第二天，姐姐和叔叔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向故乡与亲人告别：

叔叔不断回头。姐姐换了一身英国人的白衣服，帽子前面还垂下一片黑纱。告别的时候，她也没有把那片黑纱撩起来一下。

……

叔叔说：“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路上有土匪。”

姐姐说：“听说中国人害怕英国人，我有英国护照。”

说话时，他们已经到了山口上，我们在这里停下来，目送他们下山。

姐姐连头都没回一下，叔叔不断回头对我们挥动帽子。^①

这正是近代以来西藏社会变迁的缩影，对故土与母族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充满了象征意味，新旧两代藏族人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母族的情感认同完全不同。实际上到后来，就连“我”那顽固的父亲——老麦其土司也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世道真的变了。”但“父亲知道，真正有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土司，即使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土司，如果不顺应这种变化，后果也不堪设想”^②。青藏高原这片沉寂千年的土地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故事发展至此，这个旧制度以及依附在旧制度上的人的命运已经可以预见。作者以“傻子”的视角自白道：

我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结局，互相争雄的土司们一下就不见了。

土司官寨分崩离析，冒起了蘑菇状的烟尘。腾空而起的尘埃散尽之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③

土司官寨的崩塌象征着旧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灭亡，它似乎预示了这个静止社会的“历程”。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悲剧也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仅有破坏的“进化”是残缺的，于是作者不无遗憾的写道：

那么土司之后起来的又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土司官寨倾倒腾起了大片尘埃，尘埃落定后，什么都没有了。是的，什么都没有了。

①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74—176页。

②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84—185页。

③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50—351页。

尘土上连个鸟兽的足迹我都没看到。……我只看到了土司消失，而没有看到未来。^①

或许这也是阿来对整个西藏现代化历程提出的疑问，当一切都被打破以后，建设在哪里？创新在哪里？人民的未来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看，《尘埃落定》也好，《空山》也罢，都是对藏民族历史的隐喻性表达文本。也是作家阿来以文学的方式对母族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思考。这种思考满怀痛楚，饱含着作家对本民族深沉的爱。《达瑟与达戈》的写作也是基于阿来对民族未来的深深忧思，它“不是记录他们的故事，而是一次深怀敬意与痛楚的怀念”^②。《瞻对》一个重要表现维度，同样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更可叹者是西藏。时代巨潮的冲击下，这个闭锁千年的社会依然没有觉悟而行动者，仍然意图以旧的方法维系其统治，以旧的方法处理周边种种事态。^③

旧方法和新形势注定是格格不入的，虽然看不见一种崭新的未来，但西藏已经不可能再坚守在中世纪的堡垒中，也不可能永远沉浸在宗教里，它最终不得不追赶和适应现代社会，“藏区对现代性的追求最初不是民族内部自发的，是外力作用强制的”^④。这正是近代以来西藏面临的状况，这种由外力引起的现代性牵引着西藏人前行，一系列的问题随之产生。在《荒芜》中，阿来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对藏族普通百姓所带来的不适应有这样一段描述：

两个胼手胝足的农夫，站在太阳底下，嘴里吐出诸如“运动”“错误”和“突击队”这样一些庞大空洞的词汇，真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农人的词汇是“种子”，是“天气”，是“收成”，是“天灾”或“人祸”。那些空洞的并不真正懂得意义的词所造成的压力使索波感到力不从心，感到困倦万分，他想再说点什么，但连舌头都发麻发木，于是，他只是懒懒地挥了挥手。^⑤

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但前进的道路总布满荆棘。谁都渴望明天胜过今天，但现实往往并不那样顺利。经历了20世纪的数次风暴，阿来家乡所在的

①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50—351页。

② 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

③ 阿来：《瞻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314页。

④ 何言宏、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⑤ 阿来：《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那个曾经美丽的地方已经变得满目疮痍，对此他痛心地说道：“如果说，过去那些有关屠杀与集体暴行的故事还带有一些悲壮激情与英雄气概的话，现代演绎的暴力故事却只与酒精和钱财有关。”^①在大渡河上游行走，阿来常常看到曾经的原始森林变成了濯濯童山，曾经善良的家乡人民中，有一些年轻人已经丧失了祖先遗留下来的美德。他坦言，一切美好的过往都被破坏，这正是他选择离开这片土地的原因。当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一路上他充满了怀旧的情绪，甚至说：“对于我亲爱的嘉绒，对于生我养我的嘉绒，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保存更多美好的记忆。”^②

藏区和藏民在阿来的笔下始终是以“名词”的面貌存在的，阿来从未刻意将其描写成一个“东方主义”的想象物。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太多想象性的描述，更多是基于“历史的真”发掘出的“人性的美”。也正是基于此，阿来将自己与其他以西藏为书写对象的作家区分开来。他认为，扎西达娃、马原等作家的贡献是在文体上找到了一种当代的叙说方式，他们的西藏书写虽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其初衷在于营造一种神秘的、与世隔绝的氛围。^③其实这并非是文学表述西藏时面临的特殊问题，而是文学在表述整个边疆和少数民族时存在的问题。^④在全球化时代，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相遇的可能性剧增，这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文化冲突。但世界需要呈现多样的可能，文学在此过程中本应“在不同族群之间建立沟通”。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书写却一边基于严重的东方主义，另一边又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当二者合谋的时候，我们的文学空间就崩塌了，我们的书写就失去了意义”^⑤。其实，无论是“东方主义”式的想象还是地方主义，都仍以相对温和的形式存在于今天的文坛。在有这些思想倾向的作品中，读者自然无法发现边疆地带和少数民族的真相。如果要让文本表述更加接近真实，作家必须寻找到一种真正接近西藏以及普通西藏人生活的方式。只有真正懂得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与心灵，才会看到一个真实的西藏。^⑥阿来就在这样自觉的认识中完成了母语书写，虽然他主要选择了小说这种文体形式，但他努力呈现出一个真实藏区的文学关怀使他走出了书斋，走向了乡野，在山山水水间

① 阿来：《大地的阶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② 阿来：《大地的阶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③ 易文翔、阿来：《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阿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

④ 有些作品甚至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生活片段加以虚构，从而满足外来者的猎奇心理，作品因此充满了内部殖民主义的色彩，如20世纪80年代的《亮出你的舌苔空空荡荡》，由于对藏族文化和藏民生活进行了刻意而夸张的虚构，引起藏族同胞的强烈不满。

⑤ 阿来：《边疆地带的书写意义》，《四川日报》，2014年6月27日第15版。

⑥ 阿来：《西藏是形容词》，《就这样日益丰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6—137页。

进入了一个个普通藏族家庭，从而也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走进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近年来，阿来又选择了在被称为“藏边社会”的区域行走，向北到平武；进甘南；访凉州，穿越整个河西走廊；向南边则考察了以丽江为中心的茶马古道沿线的历史与人文。^①作家阿来在这些区域内行走时俨然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功底的人文学者，行走或许是要为未来的文学创作积淀素材。^②阿来从未将自己视为藏族文化的代言人，他清楚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因为没有人能够“代表这个神秘帷幕背后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民”^③。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民族构成还是文化形态，西藏本身便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任何将自己视为西藏文化代言人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关于自己的创作，阿来也一再表示：

我不太愿意说整个西藏。……我所写的这片地区是藏族地区的东北部，这个区域从文化上命名就叫嘉绒。^④

既然如此，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意义又何在呢？阿来认为：第一，文学对作家个体来说具有教育意义^⑤；第二，文学对人类群体而言具有沟通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意义。^⑥因此少数民族作家既要书写母族，又要超越母族。阿来践行了这样的文学观，他的创作超越了藏地而获得了普遍意义。

二、藏边书写与民族文学“大声音”的传达

阿来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比喻为佛教中的“大声音”，而“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一种大声音，就得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而获得历史感与命运感，而通过文学很好地表达”^⑦。他一再强调：“文学

① 参见《腾讯·大家》，<http://dajia.qq.com/column/39>。

② 阿来曾说：“文学不只是文学本身，做文学的人也应该经过适当的学术训练，掌握一些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提供的思想方法，来观察不同的文化群体和社会。”阿来：《边疆地带的书写意义》，《四川日报》，2014年6月27日第15版。

③ 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黄河文学》，2009年第5期。

④ 何言宏、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⑤ 阿来曾说：“对我来说，文学是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教育，是关于如何给这个世界增添人性光辉的教育，是关于一个人应该有着丰沛而健康情感的教育。如果说，我对将来的自己还有更大的信心，也是因为相信，通过文学这个途径，我将吸取到更多的人类精神成果，相信通过这样的学习与吸收，自己将变得更加正常，更加进取，更加健康。”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黄河文学》，2009年第5期。

⑥ 阿来曾明确表达：“文学所要做的，是寻求人所以为人的共同特性，是跨越这些界限，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与偏见，歧视与仇恨。文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理解、尊重与同情。”（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黄河文学》，2009年第5期。）

⑦ 阿来、脚印：《文学是我的宗教》，《文学报》，2005年6月2日第3版。

本质就是通过特殊的事物来反映普遍的情感跟价值观。”^①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阿来的作品，便可以发现，他的文学创作虽然是以藏地为描写区域，以藏族为书写对象，借用了大量藏族民间传统的叙事形式，但所表现出的绝非仅限于对藏族命运的关怀。这在阿来对其成名作《尘埃落定》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尘埃落定》就我本意来说，我不是要人将其看成一个虚构的遥远传奇，一个叙述奇异故事的精致文本——虽然那个封闭世界中的确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奇闻轶事。我的本意是提供一个有现实意义的样本，文化的样本，世俗政治的样本。^②

“现实的文本”“文化的文本”“世俗政治的文本”，充分说明了阿来希望他的作品应具有普遍性意义。因为文化和世俗政治几乎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并不为藏族所特有。虽然读者在作品中看到的是土司制度的崩溃，是中国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一种特殊制度的解体，但类似于土司制度的各种政治制度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无不经历着类似的过程。所以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无论他们是否以本民族为书写对象，只要他们有全人类的意识，他们的作品便会具有普遍意义。阿来以《尘埃落定》为例，坦言其写作目的并不在于仅仅表现藏民族的爱与恨、生和死，而是希望通过书写青藏高原东部一隅人们的爱与恨、生和死，来表达全世界各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③

好的文学不但会变成一种“大声音”让众生听闻，而且还能提升创作者自身的水平。就阿来而言，他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实现自我教育，以此建立起自己与世界的广泛关联。^④ 因此，他的每一次创作都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每一次创作都充满普遍的关怀。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瞻对》，看似书写的是康区一个由土司统治的小地方，但却力图呈现这个数百年来不断与中原王朝发生矛盾的“铁疙瘩”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这部小说的创作固然源于对这一历史题材本身的兴趣，但也包含了阿来非常明确的现实关怀。他力图通过一个地方的个案，挖掘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

我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这里面也包含我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希望这个国家

① 易文翔、阿来：《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阿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

② 阿来：《文学对生活的影响力——为伦敦书展所作的演讲稿》，《厦门文学》，2012年第10期。

③ 冉云飞、阿来：《尘埃落定看阿来》，《中国西部》，2001年第1期。

④ 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黄河文学》，2009年第5期。

安定，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①

这个屹立于康区数百年的“铁疙瘩”在清末民初的社会锻造中被熔化了，阿来将其内因归纳为“势，大势所趋”。而至于何为“势”，阿来并未在作品中点明，他只是通过详尽的史料为我们呈现了这一过程，其中的“势”与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变迁相关联。这部小说渗透了作家对民族、国家之爱，也蕴含着作家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因此被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评价为：“这些经验对今天四川藏区的治理仍具有相当完整的借鉴意义”^②“这实际上是政治教科书”^③。当然，阿来的关怀远不止于此，他清楚地意识到，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解决方式，是可以从历史中寻求启发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或许是揭示不同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有效工具。^④

但这样的文学追求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作家就必须摒弃本民族书写，他们往往可以通过书写本民族展现人类的命运。其实，许多伟大作家都是这样，虽在作品中对人类历史与命运做出了深刻的思考，但他们的文学地理却是其熟悉的土地与人民。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虽都是小地方，却并不影响作品的伟大。阿来建构的文学世界也未曾离开他生活的那片大山褶皱之间的土地，因为他意识到：“文学的真正价值一定是立足于本土的书写。”^⑤所以，虽然《尘埃落定》的故事发生在土司时代，《空山》中的机村虽然是虚构的，但我们不难看出它与阿来出生的那个叫马塘的村子的某种相似性。《格萨尔王》中虽然没有具体的地理空间，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康藏大地是故事展开的舞台。而《瞻对》本身就是故事发生地的名字。这些看似并不宏大的文学世界，并非作者随意写就。在六卷本的《空山》中，阿来居然将所有故事放入一个小小的村落，以数个人物的命运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在书写一个藏族村落历

① 阿来、杜羽：《对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关于〈瞻对〉的对话》，见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② 朱维群：《我读〈瞻对〉》，见《瞻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③ 阿来：《瞻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腰封。

④ 阿来曾以《瞻对》为例，对文学的这种功能做出如下说明：“通过对瞻对的过往历史的打捞，在透视其命运传承中，触摸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节，瞭望一个时代的族际交往，揭示不同民族的文化汇流。有人认为我的这部作品写出了‘民族的精神秘史’，我自己觉得是在挖掘隐藏在现实深处的历史情结，表达藏汉人民追求和谐、文明的民族品格。”张江、朝戈金、阿来等：《重建文学的民族性》，《人民日报》，2014年4月29日第14版。

⑤ 阿来：《边疆地带的书写意义》，《四川日报》，2014年6月27日第15版。

史与人物的同时，呈现出中国所有村落的历史进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命运。^① 这让笔者想到，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村落作为研究中国的最基本单位，试图通过对不同类型村落的民族志描写，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征。阿来虽没有在中国寻找不同类型村落的计划，但在他的创作中，机村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地理空间。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是整个中国都曾实实在在经历的，在这种意义上，机村可谓中国的缩影。与其他的非藏族村落相比，机村“虽然存在着地区差别、民族差别，但是各民族人民的经历、命运、理想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基本倾向、基本矛盾等却保持着基本的一致”^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质”与“时代观念”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经不断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民族特色是与其相适应的时代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不可避免地会给每一个民族的生活带来变化与变革，因而民族特色也会随之而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生革新与发展”^③。阿来是很好地把握了两者关系的少数民族作家，“民族特质”体现为他所营构的文学世界是以藏地为原型的，而“时代观念”则通过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即社会变革呈现出来。实际上，无论是《尘埃落定》，还是《空山》和《瞻对》，书写的都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制度变革，这些变革并非文学虚构，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阿来对历史是情有独钟的^④，我们如果全面考察他的文学创作，便可以发现，《尘埃落定》“是写藏区社会在上个世纪前50年的变化，主题很简单，就是西藏社会旧的制度的终结”^⑤，它“提供一个价值观，而且是积极的价值观！”即“遵从历史的大势”。^⑥《空山》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藏区在被纳入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中所遭遇到的与全国同步的经历，以及在这段经历中普通藏族人的命运。《尘埃落定》《空山》两部作品共同构成了藏区的20世纪

① 参见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② 玛拉沁夫：《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导言。

③ 玛拉沁夫：《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导言。

④ 他曾说：“其实我对历史的兴趣更大一点——但这并不是说我对小说的文体呀、语言呀，这些艺术层面的东西就不重视——我放在第一位思考的，首先是历史。”何言宏、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⑤ 阿来、谭光辉等：《极端体验与身份困惑——阿来访谈录（上）》，《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2期。

⑥ 易文翔、阿来：《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阿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

史。之后的《格萨尔王》回到藏族古代，对传说中荡气回肠的英雄时代进行了深入挖掘；《瞻对》表现的则是清代以来四川藏区的变革。由此可见，阿来的每一部作品都选取了藏族历史上某个关键的节点，通过对这个节点的描写，呈现藏族社会、文化的整体变革，以及在历次变革中普通人的命运。

但阿来描写藏区的变革并不是基于怀旧情绪，相反，在他看来，历史的前进不可阻挡，社会的变革也势在必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历程，是大势所趋。在《瞻对》中，阿来用“进化”来形容历史的发展，他在评价瞻对自乾隆九年到清末的一百多年的历史时说：

时间白白流逝，老套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不断循环……真正充满悲剧感的，是历史的停滞……时间的意义是其流逝之时，社会的演进与进化。但在我们这个故事中，几乎充满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戏剧要素，但单单缺少一个主题词：进化。^①

可见，社会必然进化，作家自然也不能总生活在怀旧情绪中，相反他的任务是要作为一个旁观者去描述变革。^②当然，他更应该关注在这一过程中普通人的命运。

三、地域和族群书写中的人性深描

文学致力于对个人命运的书写，因而有“人学”之称。作家只有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体会个体生命的悲剧性，才能超越一切外在的形式，达到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思考。一种文化总有消亡的时候，一种制度总有崩坏的时候，人类的命运无法逃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官方都有详细的记录和阐释，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在这些巨大变革中普通人的命运。阿来正是从这个基点切入，写作了《空山》，希望通过这个藏地的小村庄发掘出一些更具启发性的东西。^③

阿来所谓的更具启发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是深刻的人

① 阿来：《瞻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79页。

② 阿来曾说：“我是一个观察者，我记录看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种种反应，我会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进步是好的，是必须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何言宏、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③ 阿来对《空山》的创作有如下说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整个藏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关于这个变化，我们当然得到过很宏观很官方的解读。但我想从一些人的命运，以文学的方式入手，来解读，来探究旧制度瓦解的过程，以期发掘出一些更具启示意义的东西。”阿来：《一部可能失败的村落史》，《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

性。制度终究会变化，社会必然要前进，但在一次次的剧烈变革中，普通人的命运却往往遭遇悲剧性结果。一个好的作家在面对不可逃避的现实时，必须对此怀有悲悯之心。所以在《孽缘》中，当写完一次饥饿岁月中的会餐后，阿来甚至袒露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我必须抑制住因写作而复苏了的某种强烈的感情。我提醒自己注意，我写那次会餐已经写到了关键部分。我必须在这里揭示出在一种带着强烈的戏剧性色彩的生存状况下的泛人类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生命本能与生命追求的崇高品格之间相互冲突的悲哀。我想这是支持我写下总题叫做“村庄”的这一个系列的惟一理由。^①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段类似戏剧旁白的话语是阿来悲悯意识的自然流露，那种具有喜剧性但却让读者笑中带泪的场面或许并非完全出自虚构，而是对饥饿年代的艺术再现。阿来想通过看似荒诞的会餐场面，表达生命个体的尊严。在他看来，作家如能透彻地把握住人类命运的悲剧性，并怀着深深的悲悯意识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有可能使文学作品成为人类的良心。这再一次证明，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无论选择怎样的题材进行创作，无论他笔下的人物具有何种民族身份，无论他采用哪种创作方式，都不会改变通过书写普通人的命运而透视人类悲剧性存在、把握深刻人性的创作本质。

当然，人的命运是丰富多样的，《尘埃落定》中的桑吉卓玛嫁给了银匠，聪明的哥哥死在了刺客的手下，傻子“我”最后也被刺杀，而老土司在新的社会形势面前只能看着自己的官寨轰然倒塌；在《随风飘散》中，格拉在兔子死去以后，成为村里的替罪羊，最终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天火》中，巫师多吉未能幸免于那场天火，格桑旺堆在时代的风暴中被视为阶级敌人，就连那个一心想挣表现的年轻人索波，也郁郁不得志。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巨变面前是如此脆弱，他们卑微地活着，随时面临被摧残的可能。这是否就是宿命？阿来肯定的给出了回答：不是。他创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悲剧色彩，而终究是要在卑微的生活中发现美，在悲剧中看到希望。^②

如果说文学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以悲悯之心把握人的悲剧性命运，那么，作品民族性的呈现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呢？笔者以为，对人物命运的书

① 阿来：《阿来中篇小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② 阿来对此曾有如下表述：“我本来的愿望是要把众多的人（包括我自己）的日复一日的卑微生活中的美、庄严与真诚揭示出来，使我们深受等级观念、宿命论与悲剧色彩浸泡的灵魂看到一点温暖的光芒，同时也使灵魂不只为这个要吃要喝要穿要性交要排泄的终将消失的躯壳所驱使。我所以创作是对这种人的命运充满理解与同情。”阿来：《人是不朽的》，《民族文学》，1990年第4期。

写正是展现民族性的重要手段。人物总会有族属，总会有生活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他们的描写也必将牵涉对一个文化的书写。要想作品中的人物生动起来，就要不仅将其置于一定的故事情节中，更要将其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里。以《尘埃落定》为例，阿来塑造了诸多生动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的命运，但由于故事发生在土司统治下的藏地，其中的关键性人物都具有藏族的身份，所以整个作品的民族特色非常鲜明。如在描写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权力时，作品便将其与藏族历史文化特点相结合：权力与“骨头”相关联。^①这不仅涉及藏族对等级来源的认识，而且也包含了他们对世界构成的阐释。在藏文化的视角下，正因为骨头和根子的不同，所以人被分为许多类型。阿来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在那个时代定出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骨头沉重高贵的人是制作这种规范的艺术师。

骨头把人分出高下。

土司。

土司下面的头人。

头人管百姓。

然后才是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然后是家奴。这之外，还有一类地位随时变化的人。他们是僧侣、手艺人，巫师，说唱艺人。^②

在《尘埃落定》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能在这个人为划分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坐标，正因为故事是在这个事先已经设计好的框架中进行，所以整个叙事充满自然流动的和谐，这是与藏族的历史、文化、世界观等相契合的。也正因如此，它在表现藏族土司制度崩塌过程中普通人的命运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也说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与人类的普遍性并非截然对立的，在表现人类普遍性时，民族或地域的特殊性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呈现。少数民族作家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意识，便不会在写作时因表现普遍人性而担忧民族性的缺失了。^③

① 原文如下：“骨头，在我们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词，与其同义的另一个词叫做根子。根子是一个短促的词：‘尼。’骨头则是一个骄傲的词：‘辖日。’世界是水，火，风，空。人群的构成乃是骨头，或者根子。”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②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③ 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小 结

藏族虽有着发达的民间文学和丰富的古典文学，但其文学的现代转型则相对较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在此背景下，从“藏边”嘉绒地区走出来的阿来便显得尤为突出。他是较好地文学创作和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的藏族作家，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汉语写作与文学民族性的呈现、民族文学中人类关怀的传达，以及如何用文学表述藏地和藏人等问题上都有充分的思考。阿来批判了对西藏或藏地的“形容词”式表述，指出应在深入青藏高原民众生活的基础上，以特定地域和民族为书写对象，最重要的是要传递出一种“大声音”，因此他主张民族文学要有时代观念，能深描人性，并表现时代变革中的个人命运，恢复其“名词”的面貌。总之，阿来的创作经验和民族文学思想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提供了一种范式，它不仅解决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特质和时代观念之间的矛盾，^①而且还实现了民族特质与人类意识的结合。

作者简介：

李国太，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① 《民族文学研究》评论员：《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民族文学研究》，1986 年第 8 期。